

# 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

● 姜義華

198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以「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為題作了長篇演說，論定中國百餘年來走了一段思想不斷激進化的歷程，過分微弱的政治保守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幾乎沒有發生制衡的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思想不斷激進化的最高峰。這篇演說在海內外都獲得了一批響應者，一時間，呼喚保守主義，譴責激進主義，竟成了一股在學術研究與政治實踐中都頗有影響的思潮。

余英時認為，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往往就變成了保守主義者。

## 一 百年來保守主義太弱還是太強？

何謂保守主義？余英時先生認為，保守就是要維持現狀，不要變，激進就是對現狀不滿意，要打破現狀。以此，他論定，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要求變革較少

的人往往就變成了保守主義者。根本原因就在於百餘年來中國無現狀可維持。

對保守主義這樣定義恐怕並不確切。英國保守主義第一個大師柏克(Edmund Burke)1790年所寫的《法國革命感想錄》堪稱近代保守主義原典，裏面所闡釋的六個主要論題是：尊重宗教並使之為國家所承認；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得侵犯個人權利；不能以革命的平等觀念取代等級和地位的差別，確認私有制是神聖的制度；承認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非機械體；保持同過去的連續性，盡可能使變革逐步進行而不打亂原來的正常秩序。英國保守黨政論家塞西爾(Hugh Cecil)1912年所寫的《保守主義》，概括英國近代保守主義由三個部分組成：天生的守舊思想，即所有的人內心所固有的不信任未知事物和眷戀所熟悉的事物的思想；王黨主義，即衛護教會和國王、尊崇宗教和權威的原則；帝國主義，即熱愛國家的偉大和熱愛使其偉大的上下團結。這兩位所闡述的保守主義，長期成為保守黨的思想基

礎。在這裏，保守主義顯然並非不要變，或是要求變革較少，而只是要求使變革範圍於特定的價值取向之內，範圍於尊重傳統、尊重權威、民族主義等範圍之內。

按照保守主義的經典意義來衡量，保守主義者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義勢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強。固守着傳統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傳統社會觀念與人生目標的億萬民衆，是保守主義頑強存在並不斷四面出擊的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且不論這一基礎多麼頑強而有力，就以其理論上系統的表現以及社會政治上的實踐而言，也絕不可以小視。

以文化保守主義而言，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至少已經形成都很有影響的三股潮流：以《勸學篇》和《翼教叢編》為代表，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旗幟，或逕直以翼聖經、扶綱常、復名教、正人心為號召，維護以孔孟之道為主幹的傳統思想：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孟子微》、《中庸注》、《大學注》、《論語注》為代表，圖謀通過對儒家學說新的解釋，給它注入新的生命力，建立孔教，樹立一個足以壓倒舊權威的新權威：以《國粹學報》為代表，倡導國粹主義，努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各種積極資源，給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提供道德之源泉、功業之舊墟、文章之靈奧。這三股潮流分別以封建衛道者、君主立憲主義者及投身反清革命者為其載體，但是，在堅持文化本土主義，堅持向本國傳統文化的形式及其若干內容認同方面，都具有文化保守主義的根本特徵。

自辛亥革命爆發以來，上述三股思潮各自沿着自己的路線向前發展。

首先是傳統的衛道派，袁世凱統治時期遍及全國的各種孔教會，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辜鴻銘及東方文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肯定和提倡，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後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尊孔讀經運動，都是《翼教叢編》派的繼續。影響更大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30年代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50、60年代台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兩個新的高潮。

其次是力圖給傳統文化注入新生命的新儒學運動，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張君勱的提倡玄學，到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錢穆構建的新心學、新理學、新史學，到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所構造的新儒學，比之前一股思潮影響要更廣泛，更深刻。

國粹主義派在辛亥革命以後，逐步演化為在各個專門學科領域內對傳統文化資源的發掘、清理、研究。數十年來包括易學、尚書學、詩學、禮學、公羊學、穀梁學、左氏學、論語學、孝經學、孟子學、爾雅學在內的經學研究的成就：包括甲骨學、金石學、聲韻學、訓詁學、文法學在內的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成就：包括古代正史、別史、地志、敦煌學在內的史學研究的成就：包括先秦諸子、漢魏兩晉南北朝諸子、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在內的諸子學研究的成就：包括古文、白話文、駢文、古詩、詞學、曲學、古典戲劇小說在內的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存在與活躍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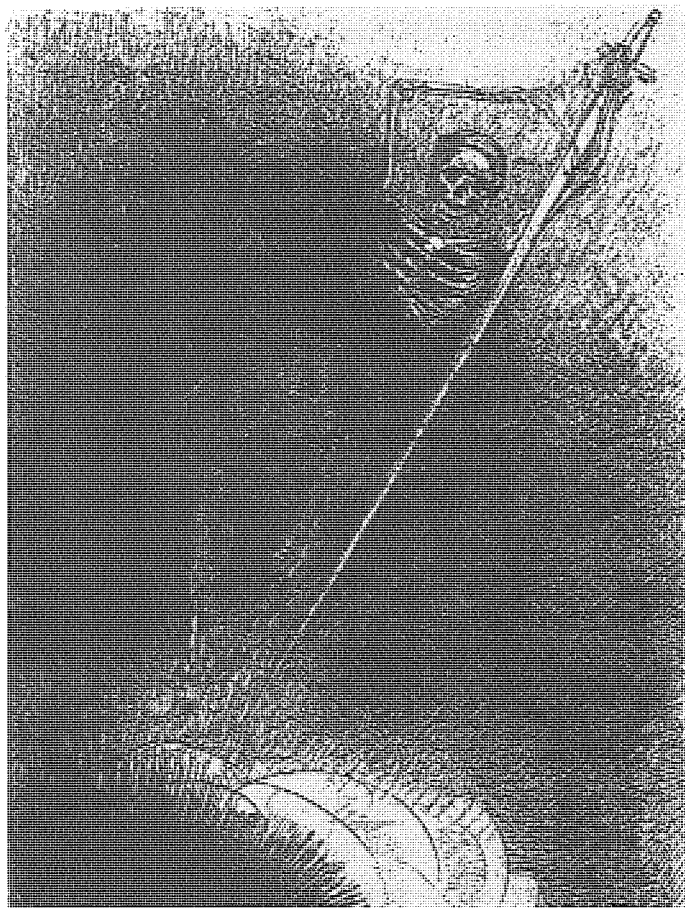
就政治保守主義而言，從清末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到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到國家主義派的活躍，到國民黨軍

保守主義者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義勢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強。

就政治保守主義而言，從清末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一直到80年代後期新權威主義的提出，貫穿於其中的，正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內核的認同與呼應，這就是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構，確保行政權力對於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全面支配。

關於中國沒有努力維持現狀、維護傳統的保守主義及保守主義者的論斷，顯然低估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歷史傳統和它在百餘年來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影響。

圖 百年來，保守主義是如此根深蒂固，它是太強而不是太弱了。



政、訓政的實施，到30年代新式獨裁論、新法家理論的提出和40年代戰國策派的登場，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集團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橫行，一直到80年代後期新權威主義的提出，貫穿於其中的，正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內核的認同與呼應，這就是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構，確保持行政權力對於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全面支配。

七十多年前，魯迅在一篇隨感錄〈來了〉中寫道<sup>①</sup>：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甚麼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麼，我們何嘗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麼，我們卻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

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所以無論甚麼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甚麼主義。

這一段話寫得極為痛切，所述情況不幸卻是事實。中國保守主義是如此根深蒂固，許多洋貨的甚麼主義一進來就免不了要被同化、變形，最後甚至除去剩下一個名號外整個變得無影無蹤。1949年3月，毛澤東確認，「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sup>②</sup>。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對毛澤東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澤東答道：「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sup>③</sup>。這不是過謙之詞，於此可見，關於中國沒有努力維持現狀、維護傳統的保守主義及保守主義者的論斷，顯然低估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歷史傳統和它在百餘年來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影響。

## 二 百餘年來激進主義太強還是太弱？

激進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威力？結論經常歧異極大，甚至截然相反。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制度。康有為認為，這場革命太過分了。他在1913年〈中國學報題詞〉中罵道：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視民視，革命乃吾中國最尋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舉中國數千年之命亦革之乎？今也教化

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俛俛無所之，……

康有為認為，正因為如此，造成了「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墮斲，禮俗變易」，使「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④。

面對同一現實，站在革命營壘中的章太炎卻不作如是觀。1913年4月，即康有為發表〈中國學報題詞〉的同一個月，章太炎在國民黨歡迎會上檢討說⑤：

民國成立，輒曰維持現狀。所謂現狀，亦未說明。據兄弟看來，民國非維持現狀也，乃維持現病耳。若坐視腐敗專制之病存留中央，則民國共和終成夢想。

隨後，章太炎在〈檢論·大過〉中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認為嚴重的教訓就是「今倡義不過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屆不及墨吏。人民見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謂愈可以徼幸得之。」在〈檢論·近思〉中，他進一步指出：「廢興之際，玉步可改，裳服可變也。其故吏親媚者，天性狃為附庸小腆，染於亡國舊污，而不與玉步裳服偕亡，不剛制不得去。」

兩人都對現狀極為不滿，可是，一則歸之於革命超越了革一朝之命這個傳統的範圍，另一則歸之於維持現狀，未破壞專制惡根。

類似的爭論，幾十年來一再重新展開。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聯名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

建設宣言〉，劈頭就宣佈：「沒有了中國」⑥：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内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

同年三月，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針對上述判斷作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⑦：

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内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甚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

雙方的論點，儼然二十多年前康有為、章太炎爭論的翻版。

文化大革命已被歷史實際判明，是一場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的本質，究竟是激進化走到其全面反傳統的頂點，還是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不僅被繼續保存，而且還廣為泛濫，兩種結論同樣針鋒相對。余英時先生將十年文化大革命視為近代激進化進程的最高峰，其實，這只是看到了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徹底決裂和靈魂深處鬧革命這樣一些口號，未深入考察文化大革命所維護和堅持的究竟是甚麼。那種泛道德主義、泛政

余英時將文化大革命視為近代激進化進程的最高峰。其實，這只是看到了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徹底決裂和靈魂深處鬧革命這樣一些口號，未深入考察文化大革命所維護和堅持的究竟是甚麼。

治主義，那種只不過是使貧困普遍化的平均主義，那種圖騰化、宗教化了的個人崇拜與個人專斷，都正深深地扎根於中國的傳統。其實，余英時先生也說過，紅專關係淵源於程朱陸王的尊德性與道學問，破私立公淵源於宋明理學的破人慾存天理<sup>①</sup>。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確處在一場激烈的社會大變動之中。各種力量都對現狀不滿，但近代化現代化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力量有限。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取得統治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動亂，並非反傳統，他們的生命力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傳統的東西。構成社會大變動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波瀾壯闊的現代農民戰爭、現代農民運動，他們所追求的，大家有田耕，大家有飯吃，五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並非全盤反傳統。以都對現狀有所不滿而將這三種路向迥異的運動都放在激進主義範疇之內，這個激進主義便失去了和保守主義相對應的應有涵義。真正改變傳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規範與結構，而代之以與現代文明相

適應的新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規範與結構的激進主義在百年來大部分時間中，實際上是相當幼弱的。

激進主義事實上不是太強，而是太弱。這種弱勢集中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近代化現代化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都相當弱小，文化力量稍大一些，但同經濟、政治、社會力量一樣，僻處一隅，這就是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及沿江、沿鐵路的一些大中城市，處在廣大內地與廣大農村的重重包圍之中；基本上局限於接受了新文化洗禮的少數新型知識分子及投身於實業、政界的少數新人；處在廣大繼續為傳統觀念所支配的下層社會民衆包圍之中。

其次，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運動發端於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的入侵，其後，在推進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和傳統政治社會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具有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力量，有從買辦、官僚、地主士紳轉化而來的民族資本主義力量，有不僅與社會化大生產同命運而且不

圖 構成社會大變動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波瀾壯闊的現代農民戰爭。



懈地為使現代化成果為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的奮鬥的新的社會力量，這幾支力量的主觀意圖、利益原則、行動方式互不相同，彼此之間有相通的一面，嚴重的衝突和內耗，又不能不削弱本已有限的近代化現代化力量。

再次，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運動內部，也滲透了大量非近代化現代化的成分。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幾乎與此同時開始資本積累積聚，中國以機器大工業建立為標誌的產業革命，從起始便是同君主官僚專制主義權力統治緊緊結合在一起，同傳統的地租剝削及超經濟強制緊密結合在一起。它造就了國家壟斷資本，同時堵塞了被無情剝奪的廣大農民轉變為以商品經濟為業的新式農民的道路。外國資本依靠強權和通過不平等條約建立的條約體制對中國掠奪性的盤剝，民族資本在重重高壓下也將自己的負擔轉加到農村與農民，造成同樣的結局。這是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運動長時間處於劣勢的內在根源。

這些事實足以證明，致力於將中國從古代文明引向現代文明的真正的激進主義，力量是不宜誇大的。

### 三 在多元衝突中進行艱難選擇的歷程

余英時先生認為，基本上中國近百年來是以變革、變動、革命這些「變」作為基本價值的。而這個「變」卻沒有一個底。中國自戊戌運動乃至更早開始的變，究竟有無一條底線？如果說，十九世紀後半期人們只是籠統地意識到中國正面臨三千年、四千年或五千年未有之變局，那末，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康有為、孫中

山等人那裏，引導中國從古代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底線實際上已經相當清晰地鈎畫出來。二十世紀中國的變革，確定的目標是存在的。這個目標大體上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代經濟取代長期停滯在落後狀態的古代經濟，在中國大地上，逐步以社會化大生產取代原先分散落後的小生產，以現代商品市場經濟取代傳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全國性及世界性廣泛而直接的聯繫取代先前狹隘封閉的地域性及政治強制性的聯繫，從而逐步實現社會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

其二，變以忠孝為中心的社會價值體系為確認個人自主、自立、自由的價值體系；變以尊經明道強化禮教的社會知識與教化體系為以崇尚和發展科學、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知識與教化體系；變以靜為核心的行為體系為以動為核心的行為體系；變泛道德主義、泛政治主義的社會文化規範為以生產力不斷發展為中心的社會文化規範。

其三，使社會大變革的成果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防止像西方許多國家所曾經發生的那樣，出現新的兩極分化和激烈的階級對抗。

論者以梁啟超首倡、近來應和者日多的器物、制度、觀念三層次變化依次推進論，證實不斷激進化這一論點。其實，器物層次、制度層次、觀念層次的變革從來就是相倚結伴而行的。而且，一般說來，總是觀念層次的變革最敏銳、最活躍，制度層次的變革最艱難。梁啟超將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列入制度層次變革，但是，他的老師康有為在投身實際政治之前，從他的《民功篇》、《教學通義》、《康

中國以機器大工業建立為標誌的產業革命，從起始便是同君主官僚專制主義權力統治緊緊結合在一起，同傳統的地租剝削及超經濟強制緊密結合在一起。它造就了國家壟斷資本，堵塞了廣大農民轉變為以商品經濟為業的新式農民的道路。

子內外篇》、《實理公法全書》，到他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傑士上書彙錄》，用力最多的難道不正是觀念層次的改變麼？即以梁啟超本人而論，他所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他所撰寫的《中國積弱溯源論》、《新民說》，改造國民性的呼籲激烈程度又何讓於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呢？

綜觀二十世紀的中國，少量的大工業生產和大量使用手工工具的分散的小農業勞動同時並存，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和大量落後於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並存，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廣大貧困地區同時並存。面對着這多個世紀並存的局面，康有為不躐等而進的改革，孫中山希圖畢其功於一役的三民主義，章太炎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光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所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其說是一個比一個激進，毋寧說是為達到在中國建設現代文明的目標作出的不同的道路選擇。

不同的選擇，分歧首先在如何解決中國農民、農業問題：一是要不要耕者有其田，滿足廣大農民的地權要求；二是要不要限制、打擊及至消滅長期在農村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三是用甚麼樣的方法引導農民和農業生產向現代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康有為等迴避了第一、二個問題，實際上是打算在承認農村土地佔有現狀的前提下通過發展農業科學技術、增加對農業的投入的辦法來解決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但在第二個問題上態度比較溫和。毛澤東在一、二兩

個問題上都很激進，在第三個問題上卻過分迷戀於農村公社式的小生產共同體，一種仍然建立在手工工具勞動為主基礎上的擴大的自然經濟。鄧小平在農村所實行的改革，是在承認農民對於土地相對穩定的佔有權、使用權的條件下，通過促進發展鄉鎮工業、發展農業商品市場經濟及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等途徑來解決上述第三個問題。這裏的問題恰恰是哪一種選擇更切合中國實際。

分歧其次在如何解決建設現代文明所需要的資金積累積聚問題：一是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究竟是通過剝奪的辦法，還是通過提高生產力水平的辦法，從他們那裏獲得必要的資金？二是如何準確地把握建設的規模、速度和合理配置，使資金及其他各方面的負擔不超出現實所能承受的水平，保證現代文明建設能協調、穩定地向前發展，避免出現大的失調與危機？三是如何藉助國家政治權力把有限的資金集中起來而又防止國家資本變為少數權力掌握者所壟斷或揮霍的私產；如何通過發展私人資本作為國家資本的輔佐而又防止資本向極少數私人手中集中？在這些問題上，人們有着極不相同的主張，同一個人不同時期也有過很不相同的主張，無論是孫中山、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個反覆認識、反覆實踐的過程。正確的構想與重大的失誤曾多次集中在同一個人、同一個派別、同一個政黨身上。這裏的問題也不是後人比前人是否更激進，而同樣是哪一種選擇更切合中國的實際。

分歧還突出地表現在對外部世界究竟應當採取甚麼態度，建設現代文明過程中需要建立一種甚麼樣的政治體制、一種甚麼樣的意識形態等等一

不同的選擇，分歧首先在如何解決中國農民、農業問題；其次在如何解決建設現代文明所需要的資金積累積聚問題。分歧還突出地表現在對外部世界究竟應當採取甚麼態度，建設現代文明過程中需要建立一種甚麼樣的政治體制、一種甚麼樣的意識形態等等一系列問題上，很難用不斷激進化一語概括這一曲折過程。

系列問題上，說到底，也是哪一種選擇更加符合中國實際需要和實際可能的問題。即如在政治上，康有為主張君民共治，孫中山主張軍政訓政憲政，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建立的工農兵蘇維埃，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三三制」民主聯合政府，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鄧小平時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樣都認為在中國現有條件下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具體作法又有很大不同，很難用思想不斷激進化一語概括這一曲折過程。

近百年來，除去以上一些最有影響的選擇外，還有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鄉村建設、國家社會主義等等其他各種主張。為了在中國建成現代文明，人們曾經參考了英國、俄國、德國、日本、法國、美國、蘇聯等等各種模式，設計了、試驗了許許多多方案，經過無數曲折、反覆，花費了極大代價，通過多方面的比較，方才逐步懂得在中國為甚麼必須通過同億萬農民結成聯盟的方法來建設現代文明，逐步懂得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使現代化既能給廣大民眾不斷帶來實際利益而又始終保持自身的主導作用，不讓落後吞沒先進，過去壓倒未來。直到今天為止，也並非所有問題都已解決，人們還在繼續探索，繼續比較，繼續作選擇的工作，而前輩們的各種設想、各種嘗試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源。

#### 四 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 百年衝突的啟迪

中國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是百年來社會大變動的一對雙生子。百年來中國保守主義自始至終都與激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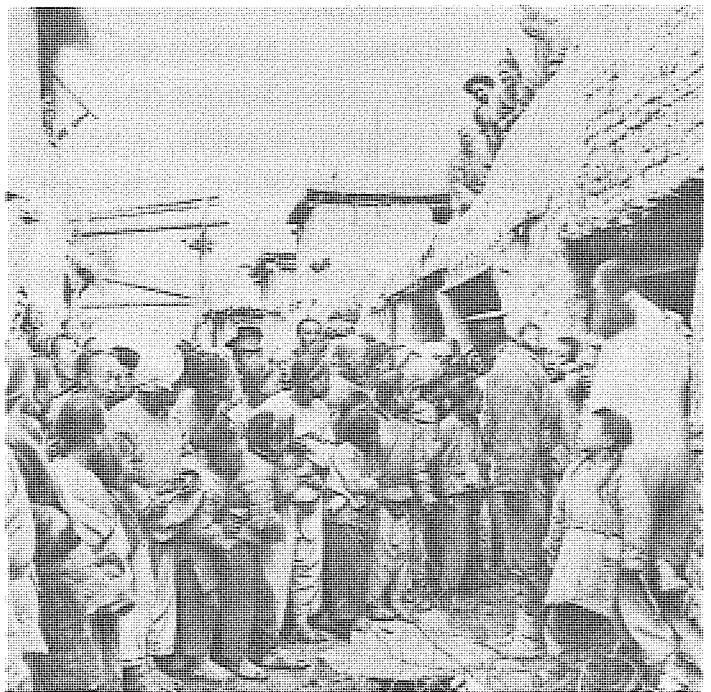
義交織在一起，互相對抗，互相爭衡，一直在激烈地衝突着。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關係是複雜的。它們二者除了互相反對外，還有互補或相反相成的一面。保守主義為了自身的利益，有時作了激進主義的事。清王朝1901年開始實行的新政，是一場自我搶救運動，但是，商務和實業的發展，新軍的編練，科舉制的廢除和留學生的派遣，都做了當時激進主義想做而未能實際做到的事。同時，激進主義為了經過迂迴的歷史之路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也會作保守主義的事。一直以代表社會化大生產和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為自己使命的共產黨人，卻花了極大的努力發動農民恢復他們千百年來一直依以為命的小土地所有制，便正是作了保守主義一直視作理想而又無魄力無膽量去做的事。

然而，就整體而言，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並沒有真正形成自覺地互相制衡、互為補正的良性關係。二者經常處於你死我活的對峙之中，形成一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除了互相反對外，還有互補或相反相成的一面。保守主義為了自身的利益，有時作了激進主義的事。同時，激進主義為了經過迂迴的歷史之路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也會作保守主義的事。

圖 究竟是通過剝奪的辦法，還是通過提高生產水平的辦法，從農民那裏獲得必要的資金？





種不是我吃掉你、便是你吃掉我的勢不兩立的關係。其結果，二者都不能免於極端化：保守主義變為頑固不化，激進主義變為過激，終導致一次又一次流血政變、武裝鎮壓、暴力革命以及內戰，社會一次又一次給捲入激烈的動盪和巨大的反覆之中。

百年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經常各趨極端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缺乏一支足夠強大、足夠成熟的中堅力量作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中產化程度過低。在這個世紀近三分之二時間中，溫飽型生活對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社會本身兩極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一部分人為着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為着使自身獲得生存的權利而進行着殊死鬥爭時，要使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都自覺地有所節制而避免趨於極端化，自然是困難的。同時，新型知識階層力量過弱。新型知識分子以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興起、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以及世界範圍的廣泛聯繫為自己的生命線，他們理應是推動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良性互動的一支最積極最理智的力量。但是，正如余英時先生《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所剖析的，在明清以來長期專制政治壓迫下，多數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自信與自尊，還滋長了一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自疑與自罪的潛意識，他們在近代社會大變革中也像先前期待着明君、聖人一樣寄希望於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和精神導師，失去了應有的批判精神，以及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獨立性<sup>⑩</sup>。新型知識階層這種不成熟的或過渡性的性格，使他們擔負不了防止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極端化的任務。此外，科舉制度廢除，舊的文官制度逐漸瓦解，

但新型的公務員制度又長期建立不起來，政權不斷更迭，在政權中發揮承先啟後穩定功能的力量卻付之闕如，政治生活一再產生斷裂與跳躍，這也助長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經常趨於極端化。

余英時先生主張「保守」和「激進」或「創新」隨時隨地互相平衡，這是有見地的。當代中國已經有條件形成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機制。但是，這種良性互動關係的真正形成，有待於對於先前歷史進程的準確觀察，更有待於確保二者良性互動的社會中堅力量的壯大，以及他們在這方面的高度自覺和實際的積極參與。當然，還需要切實解決能夠保證健康有效地操作的大量制度化、程序化方面的問題。余英時先生在其演講結束時要求養成一種文化上的雅量，對於保守主義不要動輒出之於輕薄或敵視的態度，我希望，這種雅量，對於激進主義也不例外，不要把並非由它造成的罪惡和災難一股腦兒地加在它的頭上。

當一部分人為着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為着使自身獲得生存的權利而進行着殊死鬥爭時，要使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都自覺地有所節制而避免趨於極端化，自然是困難的。

余英時先生要求養成一種文化上的雅量，對於保守主義不要動輒出之於輕薄或敵視的態度，我希望，這種雅量，對於激進主義也不例外，不要把並非由它造成的罪惡和災難一股腦兒地加在它的頭上。

### 註釋

- ① 魯迅：《熱風·五十六〈來了〉》。
- ②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 ③ 《尼克遜回憶錄》。
- ④ 《中國學報》第六期，1913年4月。
- ⑤ 《民立報》，1913年4月26日。
- ⑥ 《文化建設》卷一第四期，1935年1月10日。
- ⑦ 《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3月31日。
- ⑧ 余英時：《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8年10月）。
- ⑨ 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